

论“十七年”的文艺政策

刘东玲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文艺政策;政治功能;思想改造;政治筛选

[摘要] “十七年”(1949—1966)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基本价值指向,“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其倾向是在强化文艺的政治功能和阶级斗争功能。这种倾向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是跟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而上逻辑和左的倾向,也受到了党内有识之士和文艺界的抵制。因此,“十七年”的文艺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中图分类号] I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3)01-0035-05

“十七年”(1949—1966)时期,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显然延续了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新中国的建立急需在文化领域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加之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冷战背景,逐步形成了政治主导性文艺政策。“十七年”文学在这种基本文艺政策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文艺运动,完成了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形式的政治筛选,确立了建立在绝对无产阶级思想立场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文学规范。

在“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中,模式化、概念化与反模式化、反概念化的文艺论争一直存在,各自以高调鲜明或压抑婉曲的方式展开着不对称的论争,围绕知识分子阶级性定性问题的反复则始终映射着这种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并不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里都有所反映。”^[1]

一、在政治批判与温和调整中走向激进的文艺政策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作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以政治报告形式确立了文艺政策的高度权威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1953年6月23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从新中国建立至1956年,整个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文艺政策,一方面是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是在文化知识界展开一浪又一浪的文艺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党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经1954年的《红楼梦》批判运动,至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1953—1955),这些重大会议与文艺批判运动,不断强化政治方向至上的权威话语,由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批判的过程,是逐步清除非《讲话》精神的文艺思想,以实现思想领域的纯洁化的过程。三次运动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威性,尤其是他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定性^[2],使得这场文艺批判运动最终升级为政治批判运动,凸显政治介入造成文艺批判的极端性。对于1950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许行指

[收稿日期] 2012-09-09

[作者简介] 刘东玲,女,甘肃定西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出：“运用权力压杀对方以保持自己思想的一统，已完全越出思想争论和思想斗争的范围，变成了思想整肃，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既不是思想争论，也不是思想斗争，而是思想整肃”^[3]。此论不一定正确，但指出了一种倾向性，可作研究时参考。

由于重大会议与文艺批判都来自高层指示及政策定位，政策与运动密切相关的文艺政策特征开始形成，这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作家在这种文学与政治高度关联的背景下，很难跃出政治的羁绊，正如 Vincent Y. C Shih 所言：“How they have fared since the take over can not but be of interest to us, if only to show that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one either conform or fades away (This is true politically speaking; from the literary point of view, they all fade away.)”^[4] 这在 1956—1966 年的文艺发展中越演越烈。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陆定一发表讲话强调：“在学术批评与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5]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体现了中央的文艺思维立场，说明宽松文艺政策实施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宽松实则并不宽松，时时有着越界的危险。这也注定了这个政策的不可持续性，致使敢于质疑社会问题或思想问题的知识分子行走在危险的边缘。但文艺的政治体制并未改变，1956 年的文学繁荣只是昙花一现。1957 年下半年整风运动转为反右，使整个政治形势走向激进，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也加强了对两条道路斗争的危险性预期。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 的论断，文艺界在阶级斗争从紧和冒进的政治形势下，突出表现为政治批判色彩与大跃进色彩。1957 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与批判、1958 年浮夸与冒进气息很浓的“新民歌运动”和周扬在 1960 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均是当时“左倾”政策的直接反映。由于大跃进的冒进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危害，1961 年中共高层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 6 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

话，对 1957 年以来的偏激政策进行了批评，是文艺领域调整的反映。这一政策的重要突破在于周恩来对于政治与思想斗争问题的区分，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强调淡化思想改造的阶级斗争性。1962 年 1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1962 年 5 月，《人民日报》为纪念《讲话》发表 20 周年发表社论，主张文艺自由论争。这是对文艺界不断出现的政治批判的有效矫正，在政策上体现出对文艺基本规律的尊重，激发了文艺界的积极性。如严家炎肯定梁三老汉作为中间人物形象的意义，邵全麟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 年 8 月“大连会议”）的讲话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7]。但很快政策又走向激进：1962 年 7 月的北戴河会议，南斯拉夫经济混乱的报导，促使毛泽东再次关注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再次趋紧的阶级斗争迅速波及文艺领域。

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对于文学艺术作了以下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这个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8]。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又作了新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

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9]。

这两个批示表明,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学现状的评价,否定性越来越强;作为文坛风向标的《文艺报》迅速作出反应,1964年《文艺报》第11、12期合刊发表《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观念进行了否定式总结,实则是对毛泽东两个批示的重要阐释。两个批示实际上成为文革时期文艺政策发展的基础。1966年4月上旬,林彪、江青提交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宣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0]。《纪要》将文学创作完全阶级斗争化,与激进的政治相伴生的文艺政策走向极端。

显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以政治权威主导的文艺体制系统,这个系统在1956年前已经形成了颂歌写作的基本模式,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写作范式。“The success of new literature was assured under the intellectual banner of Chairman Mao.”^[11]作家在政治思想规训下的写作很难表达独立的思考和自我真实的情感——“a natural result of an unnatural and deranged mind.”^[12]整个“十七年”文学的写作,实则即是颂歌范式与某些特定时期短暂的宽松政策影响下文艺突破之间的变化关系。“All we can assume is that the phrases have become a manner of routine expression, not intend to carry any genuine emotions”^[13]范式与弱势调整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调,是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的过程。

二、知识分子政策:矛盾定性与实施的不稳定性

“十七年”文艺政策的理性与反理性的冲突,始终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矛盾与不稳定性直接关联,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思维定势一直左右着“十七年”文艺政策。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工人阶级),与思想定性(资产阶级)相互矛盾,这种矛盾始终左右着知识分子政策的现实运用,资产阶级思想的固化思维时时影响甚至干预知识

分子政策的规范性。或者,从根本而言,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稳定、规范的知识分子政策,导致政治形势变化,高层权威话语直接影响知识分子政策的可持续性发展。

新中国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要求文艺承担意识形态工具的功能。而这个功能的正确发挥,取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思想改造成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化的途径。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对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提倡以民主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对这个群体的社会贡献给予肯定,但又指出精神劳动者“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劳动者”与作为特性描述的“精神”一词的区别运用已经表明党对知识分子认识和界定的矛盾——肯定其工作属性,而怀疑其精神属性。从1951年秋开始,在教育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界开始了以改造思想为主题的学习运动。毛泽东曾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4]要求“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15]。与无产阶级革命相伴生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十七年”中一直处于尴尬的矛盾状态。

1951年9月,周恩来应北京大学校长和一些教授联名邀请,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讲话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及改造的必要性,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金岳霖晚年回忆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16]1951年10月,毛泽东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7]从政治立场上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

1956年底，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这一形势发生相应改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2月2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布，强调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论述，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18]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知识分子改造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受到重视，但由于强调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意识的惯性思维，知识分子身份定位的矛盾性使政策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激进时期的否定，与温和时期的肯定交替存在或同时存在。

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知识分子政策转向激进。正如胡绳所说：“5月中旬毛泽东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19]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运动波及全国，最终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局面。在反右高潮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部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社会力量，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向党进攻的敌对力量。据此，当时《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这折射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特征。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

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指明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敌人。从改造到敌人反映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激进思维逻辑。

1961-1966年，是温和调整走向激进的又一个阶段，《科学十四条》（1961年7月）、《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先后公布，知识分子问题的“左”倾问题开始得到纠正。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劳动者联盟的范围。但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扩大化。11月陆定一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提出“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非无即资”的划分。1963年2月开始四清运动，历时三年多。毛泽东在此后的几次谈话中均严厉批评文化界和各级学校的知识分子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服务。在“文革”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断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5月，他在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把广大教师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之理性消失殆尽，继起的文革文艺极端政策是这一思想逻辑的延续和扩大。

其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性，对“十七年”文艺政策有很大的影响。1957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指出：

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这个对知识分子附属性和投机性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十七年”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三、结语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发动,政治二元对立思维一直影响着“十七年”的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单一的、政治至上的倾向对“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形成大有关系。尽管这期间有过较为宽松的调整时期,但总体来说,文艺政策形而上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宽松与调整都是在政治、阶级斗争至上的背景下进行的小幅度修正,且缺乏持续性。文学批评始终与文艺政策、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决定文化的思维模式,致使文艺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也造成了“十七年”文艺政策缺

乏稳定性及规范性。对此,周晓风曾就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了准确概括:“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许多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20]但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是西方与东方的冲突,究其根源,这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主要还是一个文艺与政治不断发生冲突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文学问题即政治问题,政治决定着对于一切文学乃至文化问题的判断与取舍。不过,我们还必须指出,极“左”的文艺政策倾向受到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抵制,因此,“十七年”的文艺创作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

[参 考 文 献]

- [1][20]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16-117页。
- [2]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写了序言,并补写两条按语,将胡风文艺事件定性为:“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 [3]许行:《毛泽东的神权时代》,香港先锋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 [4][11][12][13]Enthusiast and escapist; writher of older gener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3(Jan-Mar, 1963).
- [5][7][8][9][18]冯牧:《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26、70、37页。
- [6][10]张树军、齐升:《红色决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627页。
- [14][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4页。
-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483页。
- [1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On the Literature Policy of the "17-year"

LIU Dong-l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literature policy; political use; idea transform; political screen

Abstract: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17-year" (1949 - 1966) literature policy was based on Chairman Mao's "The Talk on Yanan Literature Meeting". The enactment and useness of the "17-year" literature policy were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useness of literature. The unscientific and unstability of literature policy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policy of intellectual. The "17-year" policy reflects dialectic logic at that time.

[责任编辑:周 棉]

论“十七年”的文艺政策

作者: [刘东玲, LIU Dong-ling](#)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刊名: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nsu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13, 39(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sfdxzb-zxsh201301005.aspx